

陈庆文

要以势在必行的政策和通过立法, 来处理爱情、婚姻和生育并不容易。即使结婚与生育配套不时获得调整, 这还是一个新加坡所需努力应对的事实。

在过去一年, 新加坡的人口取得10多年来最慢的增长。截至今年6月, 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61万, 与去年相比, 增幅只有0.1%。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9月公布的常年人口简报中, 也指出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 国人更少生育和持续老化的人口。

新加坡在2016年共迎来了3万3167名新生儿, 虽比2015年的3万3725名少, 但仍略高于近10年平均的3万2200个公民出生率。随着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低迷, 公民的年龄中位数已从2016年的41岁增至41.3岁。65岁或以上的公民, 比率也从去年的13.7%增至14.4%。

即使新加坡大力推行生育计划政策, 新加坡的总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简称TFR)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就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在2016年, 新加坡的TFR为1.20。单身人士的增加, 以及更多人延迟结婚和组织家庭, 更使已非常低的生育率雪上加霜。

1993年确立的新加坡五大共

同价值观, 是普遍被接受的国家信条, “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便是其一。家庭的重要性在新加坡的社会政治论述中不断被强调。例如, 新加坡总理在每年的华人新春献词中, 总会敦促新加坡人多生育, 加强家庭关系和照顾年长者。

作为社会的基石和社会资本的根源, 健全的家庭与国家的福祉息息相关。这种范式认为“良好家庭”能够自理; 因此, 一个由很多良好家庭聚集而成的国家, 也会一样强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倍增, 家庭作为幸福、稳定和凝聚力的堡垒, 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同的论述里也提到, 家庭作为一个关键机制, 不只关乎新加坡社会经济的福祉, 也关系到对我国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文化价值传承。

然而, 新加坡的家庭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尤其是长期偏低的生育率。尽管自2008年以来, 鼓励生育的努力坚持不懈, 例如结婚与生育配套就持续地得到加强, 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在目前看来却似乎不可逆转。思维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

究竟生育率的长期低迷, 与新加坡人对前景充满莫名和不成熟的恐惧是否有关联呢? 我们不

前路茫茫的新加坡人口

断强调作为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的脆弱性, 这是否会形成新加坡未来的生存并不明朗的主观看法呢? 若是如此, 一个适应性反应或许就是少生育或不生孩子, 不然就移民。

再加上个人主义的自我放纵, 这表现在人们不愿意以超越自身利益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对竞争近乎偏执的热爱, 追求成功, 高昂的物价, 都可能造成了为了应付这里艰难的生活, 对养育理想 (可解读为少) 数目的孩子进行战略计算 (strategic calculations)。恐惧、悲观情绪、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相结合, 是否正危及全国的人口替代能力?

诚然,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会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女权通过教育而得到增强、都市化、更高的生活费, 及对家庭生活的态度改变, 都是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过, 历史也显示, 低生育率通常会造社会经济的萎靡不振, 古罗马和17世纪的威尼斯就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

虽说结婚和生育在本质上是个人决定, 但其累积影响却有着社会后果。生育子女往往代表

着自我更新的努力和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一个社会的孩童多寡, 实有着天渊之别。就此而言, 倾向于短利主义 (short-termism) 的观念和想法是占了上风。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态是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相比工作, 人们更喜欢进行休闲等非工作性质的活动。与其投资于未来, 无论是基础建设方面的开支或进行带风险, 却具开拓性潜能创新。人们反而在人口老化上有着更高的期望和提出更多的政治诉求。此外, 政府也将面对削减家庭和幼儿福利的压力。

从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 一个重点是引进移民, 这仍将在人口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只是数量上, 也包括质量。

严峻的数据显示, 如果要达到人口替代水平, 新加坡每年还需要2万到2万5000个新生儿。到了2030年, 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将有90万名, 与2010年相比, 约增加了三倍。新生儿的减少, 加上寿命的延长, 导致人口的急速老化, 双重夹击下, 进一步加重了新加坡人口危机的危机。无可否认, 在新加坡, 移民

反映了两种既互相对立, 甚至互相冲突的焦虑感。

接纳移民势不可免

一方面, 政府担心如果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填补不足, 新加坡将走上经济萎靡、社会脆弱化和在地缘政治上失去重要性的道路。另一方面, 一般人对新加坡在已经有很多移民的情况下, 还继续引进更多移民感到担忧和焦虑。

国内劳动力预料会从2020年开始下降, 保持移民大门敞开的政策, 相信不只势在必行, 还会持久贯彻。在备受争议的2013年人口白皮书的辩论中, 移民被指加剧了教育、房屋、工作方面的竞争, 并大幅度推高了房地产价格, 造成公共场所的过度拥挤, 贬低了新加坡公民的价值和稀释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等等。在其他引进不少移民的国家, 也出现了同样的情绪反应。

无论如何, 许多国家的经验显示, 由于至少从个人的层面上而言, 不是每个国民都能从中获益, 要其人民接受国家的政策如接受移民, 是一种挑战。外国劳工和新移民被指是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工资停滞、高产业价格、公共基础设施因大量移民的涌入而不胜负荷的罪魁祸首, 也就不足为奇了。

移民仍将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尽管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励结婚与生育措施, 新加坡的总生育率也难以达到接近人口替代的水平。因此, 如何让我们的社会从移民中得益, 将是政策和治理方面所面对的挑战。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得同其他争取移民的国家, 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争夺同一人才资源。同时, 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得对潜在的移民有吸引力, 而又为国内民众所接受。有时, 国内外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会出现矛盾, 甚至冲突。

新加坡的主要移民来源国如中国、印度和东南亚, 也正面临人口日益减少的现象。此外, 他们的经济正稳健增长, 移居国外的推力因素也就减弱。

看似无关紧要的个人决定, 和像结婚、组织家庭、移民等人生大事, 对公共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 可影响它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灵活性之上。

新加坡得灵巧地应对现实的人口状况, 在应付挑战之余把握住随之而来的机遇。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言论组译